

往事与随想

中

(俄)赫尔岑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5125

11

86724



200197401

往事与随想

中

〔俄〕赫·尔·岑著

项星耀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目 次

第四卷

莫斯科、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(1840—1847)

第二十五章 不协和音——新的朋友们——狂热的黑 格尔主义——别林斯基、巴枯宁及其他人——与 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——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 夫人的辩论——斯坦克维奇小组	1
第二十六章 警告——贵族铨叙局——内务部办公 厅——第三厅——岗警事件——杜贝尔特将军 ——本肯多夫伯爵——奥莉加·亚历山德罗夫 娜·热列布佐娃——第二次流放	44
第二十七章 省政府——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——神 灵派和保罗——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 治——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——骇人听 闻的审讯——辞职	77
第二十八章 痛苦的思想——流放后重返莫斯科—— 波克罗夫村——马特维之死——约翰神父	93
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。 (一)莫斯科的友人们——酒 席上的谈话——西欧派(博特金, 列德金, 克留科 夫, 叶·科尔什)	115
(二)在友人墓前	127

1959/10

第三十章 对立面。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——霍米亚科夫，基列耶夫斯基弟兄，康·阿克萨科夫——彼·雅·恰达耶夫	142
第三十一章 父亲的去世——遗产——分产——两位外甥	191
第三十二章 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——理论上的决裂——紧张的处境——到那里去！到那里去！	224
第三十三章 警察所长充当听差——警察总监科科什金——“有秩序中的无秩序”——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——护照	235
尼·赫·凯切尔(1842—1847)	247
1844年的一个插曲	282

第五卷

巴黎——意大利——巴黎(1847—1852)

前 言	292
-----	-----

革命前后

第三十四章 途中。 遗失护照——柯尼斯堡——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——到达了！——离开	293
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。 穿皮上装的英国人——诺阿耶公爵——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——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	300
西方小品。 第一集	
1. 梦	308
2. 在大风暴中	312

第三十六章	《民族论坛》——密茨凯维奇和拉蒙·德·拉·萨格拉——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——巴黎的霍乱——离境	320
第三十七章	巴别塔——德国的造反派——法国的红色山岳派——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——马志尼，加里波第，奥尔西尼等——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——在“拉杰茨基公爵号”上的旅行	346
第三十八章	瑞士——詹姆斯·法齐和流亡者——罗莎峰	388
西方小品。 第二集		
1.哀歌	412
2.附言	422
第三十九章	金钱和警察——皇帝詹姆斯·罗思柴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·罗曼诺夫——警察和金钱	431
第四十章	欧洲委员会——俄国驻尼斯总领事——致阿·费·奥尔洛夫的信——对孩子的侦查——福格特一家——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——沙特尔乡的接待(1850—1851)	451
第四十一章	皮·约·蒲鲁东——《人民之声报》的出版——通信——蒲鲁东的意义——补充	488

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

一	511
二	515
三	519

第四十二章	政变——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——荒野中的牛叫——检察官的被迫离境——秩序和文明
--------------	---

的胜利 522

家庭悲剧

一	1848年	531
二	553
三	心的迷乱	566
四	又是一年(1851年)	573
五	583
六	海洋之夜(1851年)	587
七	1852年	600
八	613
增	补	623

俄罗斯的影子

一	尼·伊·萨佐诺夫	635
二	恩格尔松夫妇	656

第四卷

莫斯科、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

(1840—1847)

第二十五章

不协和音——新的朋友们——狂热的黑格尔主义——别林斯基、巴枯宁及其他人——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——在诺夫哥罗德与一位夫人的辩论——斯坦克维奇小组

1840年初，我们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与可怜而狭小的克利亚济马河。离开我们结婚的城市，我的心情是悲痛的、惶恐的；我预见到，那单纯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会再有了，必须多挂些帆，应付不同的风浪了。

不会再有那种孤独而漫长的郊外散步，在那里我们隐没在大草原中，这么鲜明地意识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们的春天……

不会再有那种冬日的夜晚，在那时我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，掩上书本，谛听大雪橇的吱吱声和铃铛声，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，或者我们5月9日的旅行……

不会再有了！

……人们早已知道，也用各种方式歌唱过，“生命的五月只有一次，永不再来”^①，然而成年的六月，那繁忙的劳作，那路上的碎石，还是使人感到意外。在思想、感情和意愿的代数学中，青春漫不经心地向前飞驰，商数如何不必理会，也无需考虑，只有爱情，啊，未知数找到了，一切归结为一个人，一切得通过一个人，他们共同的就是可贵的，他们中意的就是美好的，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：只要他们心心相印，哪管得周围一片凄凉！

可是青春的道路上总要长出荆棘荨麻，它们迟早会刺痛肌肤，钩破衣衫。

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把弗拉基米尔随身带走，可依然认为，五月尚未过去。我甚至觉得，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学时期。周围的一切也加深了这个幻觉。同样的住宅，同样的家具，这就是那间屋子，我和奥加辽夫曾在这里锁上房间，密谋策划，尽管参政官和我父亲近在咫尺——啊，这就是他本人，我的父亲，他老了，背驼了，但仍像当年一样，随时预备责怪我回家太迟。“明天是谁讲课？测验在哪一天？放学后得找奥加辽夫……”这是1833年啊！

奥加辽夫真的在这里。

他获准回莫斯科比我早几个月。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会的中心，尽管从前的一致性消失了，大家还是同情地围绕着他。

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一样，奥加辽夫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磁性，那种女性的吸引力。别人虽无明显的原因，却乐于靠拢和接近这些人。他们鼓舞、联合和安慰人们，他们是公开的餐桌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入席，从中汲取力量，获得休息，提高勇气和信心，然后作为一个朋友离开这儿。

① 引自席勒的诗《断念》。

熟人们侵占了他许多时间，有时他也为此苦恼，但并未关上大门，依然和颜悦色地迎接每一个人。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大缺点；不错，光阴过去了，消失了，但得到了爱，不仅是亲密朋友的爱，还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爱；要知道，这是抵得上读书和各种活动的！

我从来不能明白，为什么要责备奥加辽夫这类人游手好闲。工场和作坊的观点在这里未必合适。我记得，还在大学时期，一天，我们与瓦季姆一起喝莱茵葡萄酒，他越喝越烦闷，突然，眼中噙着泪珠，背诵了唐·卡洛斯的话，而唐·卡洛斯是背诵尤利乌斯·恺撒的话：“23岁，不朽的业绩还一事无成！”^①这使他忧心忡忡，以致用尽力气，一巴掌打在绿酒杯上，把手割破了一大块。事情确实如此，但是无论恺撒，无论唐·卡洛斯和波沙^②，无论我们与瓦季姆，都未曾说明，为什么要干不朽的业绩？有工作就应该去做，问题在于是为工作而工作，还是为了流芳百世？

这一切还是模糊的；而且什么叫工作？

工作，事业^③……官员们只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，商人只承认经商是工作，军人把立正稍息，在和平时期从头到脚武装起来，叫做他的工作。我认为，成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纽带，是一件重要的工作，特别是在被隔绝和被奴役的社会中。没有人责怪我游手好闲，我所做的事，有一些曾赢得许多人的赞美，可是他们是否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中，有多少是反映了我们的谈话，我们的论争，我们无所事事地躑躅街头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，或者那些酒酣耳热、更为闲散的时刻？

① 据传说，恺撒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比较时，说过这么一句话。后来在席勒的剧本《唐·卡洛斯》中，西班牙王储唐·卡洛斯复述了这句话。

② 《唐·卡洛斯》中的人物，唐·卡洛斯的好友和导师。

③ 原文是英文。

……但不久这环境中也吹来了一股逆流，令人想起春天已经过去。当团聚的欢乐平息，酒筵散席，当重要的话题已经讲完，应该继续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发觉，那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，我们从回忆中寻找的一切，在我们的圈子里，特别是在奥加辽夫家中，已不复存在了。朋友们高谈阔论，争争吵吵，有时觥筹交错，但并不愉快，较从前已大为逊色。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，不能畅所欲言；气氛有些勉强；奥加辽夫看了伤心，凯切尔阴郁地扬起了眉毛。在我们的和声中，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，那种刺耳的噪音；不论奥加辽夫的热情和友谊多么丰富，也无济于事，无法消灭它们。

我顾虑重重、担心了一年的事，毕竟发生了，而且比我预料的更糟。

奥加辽夫的父亲已于1838年去世；他死前不久，奥加辽夫结了婚。他结婚的消息使我很吃惊——一切来得太快，太突然了。关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语，我也有所耳闻，对她不是很有利的^①。虽然他的信写得兴奋而甜蜜，我也更相信他本人，但我还是为他担忧。

1839年初，他们到弗拉基米尔来过几天。从奥兰斯基向我们宣读判决书以后，这还是我们初次见面。我不想多作评论，只记得开头几分钟，她的声音在我心头引起了不愉快的反应，但这印象转瞬即逝，消失在兴高采烈的欢乐中了。是的，这是个人幸福完美无缺的日子，在这些日子中，人们接触到了个人幸福的最高极限，却根本不会想到它的最后边界。没有丝毫阴郁的回忆，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，有的只是青春，友谊，爱，充沛的精力，无限的能量，健康和远大的前途。那时还没完全消失的神秘主义

^① 奥加辽夫的第一个妻子名玛丽亚·列沃夫娜·罗斯拉夫列娃，两人婚后感情并不融洽，她死于1853年。

情绪，也正如钟声、赞美诗和明亮的枝形烛台一样，赋予我们的会见以庄严的节日气氛。

我房中一张桌上，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的小铁十字架。

“跪下！”奥加辽夫说，“为我们四人的团聚，让我们感谢上帝吧！”

我们跪在他旁边，一边拭泪，一边拥抱。

但是四人中有一个人未必需要擦眼泪，这就是奥加辽夫的妻子，她看到这场面有些惊讶；我当时以为这是矜持，但后来她亲口对我说，她觉得这场戏是牵强的，幼稚的。我想，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这样，但为什么她要站在旁观的立场上，为什么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独她清醒，在这青春的激情中唯独她老成持重呢？

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，她前往彼得堡，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。

过了一个月，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——这时是一个人。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。她爱好华丽的外表，向往富贵的生活。“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？”我想。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，可能产生许多不幸。但财富、彼得堡和沙龙，对她都是新鲜的；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——她生得聪明，又爱奥加辽夫，因此我仍抱有希望。

在莫斯科，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。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，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，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。在贵族的沙龙中，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，她会同意，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。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，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，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。性情急躁、自尊心极强的她，不习惯约束自己，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。她桀骜不驯，态度生硬，对人冷嘲热讽，而且声音怪腔怪调，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，

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。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(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，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)，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，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；最后，她把矛头指向了我。

她怕我，但希望跟我较量，以便最后判明，友谊和爱情究竟何者居上，仿佛它们是势不两立的。这不仅是企图通过任性的争论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里还包含一种意识，认为我是实现她的愿望的最大障碍，同时也涉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权力欲。她和凯切尔争执到落眼泪，像凶恶的孩子骂街一样，每天吵架，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；对我，她却一见就脸色发白，恨得发抖。她指责我自私自利，僭望独占奥加辽夫的友谊，破坏她的幸福，指责我骄傲自大，不把她放在眼里。我觉得这不公正，因而也变得残忍无情。五年之后，她自己向我承认，她一度曾想害死我，这就可见她恨我之深。她与纳塔利娅^①断绝了往来，因为她爱我，得到大家的好感。

奥加辽夫是痛苦的。无论是她，无论是我，无论其他人，都不能谅解他。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(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讲的)作“战场”，并不考虑，无论哪一边战胜，他都同样痛心。他恳求我们和解，竭力缓和矛盾，我们和解了；但只要一句话，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，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。奥加辽夫惊恐万状，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毁，他所心爱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为神龛，她与他是两种人，但他又不能不爱她。我们志同道合，然而他悲戚地看到，命运递给他的苦水，我们不能为他分担一滴。大自然的威力把他与她联系在一起，他无法粗暴地割断这联系，也不能扼杀使我们结合的强烈共鸣。不论怎样，

^① 在本书中出现的“纳塔利娅”，在俄文原著中均为法文，下面不再一一加注说明。

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尽，他感到了这一点，力图保留她，也保留我们，神经质地拉住她的手和我们的手，可是我们却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，像刽子手一样肢解他的身体！

人是残酷的，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；孩子残酷，因为他年幼无知；青年残酷，因为他以纯洁自豪；神父残酷，因为他以圣徒自居；学究残酷，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——我们全都铁面无情，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，更是寸步不让。人心融解和变软，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，在翅膀灼伤之后，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，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——当他独自一人，没有旁观者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。心变得温厚了，于是他一边揩干惊惧和羞愧的汗珠，怕人看见，一边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，但找到的却是别人的理由。从这时起，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厌恶。

那时我还离此甚远！

敌对状态时起时伏地继续着。满腹怨恨的女人在我们不知宽容的追击下越走越远，终于陷入这种纠纷中不能自拔，她挣扎，倒下，可是没有改变。感到自己无力取胜，她为烦恼和委屈所苦，为没有爱情而嫉妒。她那些混乱的思想，毫无系统地取自乔治·桑的小说，取自我们的谈话，从来没有使她对任何问题获得鲜明的概念，却把她从一种谬误引向另一种，引向她错认为独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径，引向所谓女性的解放，根据它，她从现存的和公认的事物中，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满的一切，又固执地保留其他的一切。

决裂成为不可避免了，但奥加辽夫仍对她恋恋不舍，拖了很久，想挽救她，对她寄托着希望。当她身上有时冒出一股柔情，或者一缕诗的气息时，他便准备永远忘记以往的一切，开始和谐、静谧及爱的新生活；但她无法克制自己，再度丧失平衡，而每

次的反复只是使她愈陷愈深。他们之间的纽带一丝一丝地痛苦地拆裂，终于无声地磨破了最后一条线——他们决裂了。

在这一切中，有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。奥加辽夫对周围一切人产生的强烈影响，激发了共鸣，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，引向共同的事业，偏偏在这女人心头轻轻掠过，未留下丝毫有益的痕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何况他热爱她，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气和精神，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；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爱他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

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。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，后来才逐渐明白，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，它本身并无矛盾。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，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。在教堂内传道，在讲坛上说教，在课堂上讲学，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。在讲堂内，在教堂和俱乐部中，共同的意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，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，以便继续发展它们。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，年轻的学者、艺术家和文学家；共同的信仰，共同的语言，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对于某些人，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，他们就相继离开，由另一些人所代替，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合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，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。

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，它的基础不同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合性，一种自发的本能。我们先是接近，然后才互相认识。有些人，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，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，均势是容易建立的；他们一切都无定论，他让步一半，她让步一半，即使不让步，也不足为患。相反，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，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，便张皇失措。仓猝之间，他就想唤醒她，但在多数场合，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。她与旧的一

切隔绝了，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，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，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，于是傲慢，自大，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，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。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，一片混乱……这并不奇怪，缰绳丢了，利己心失去了控制……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，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！

教育的才能，就是善于耐心地爱，全心全意地、持之以恒地、忠诚不渝地爱，这是比其他一切更为罕见的才能。关怀备至的母爱，说理充分的辩证法，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。

难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责骂他们吗？有时对大人也是这样，因为责骂是容易的。我们自己无能，却用惩罚向他们进行报复！

这是奥加辽夫当时就理解的；正因为这样，大家（包括我在内）才会责怪他过于温和宽厚。

……聚集在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，已经与以往不同。除了我们，只有两个老朋友还在。调子，趣味，活动——一切都变了。斯坦克维奇^①的朋友们都占了主要地位；巴枯宁和别林斯基站在他们前列，他们每人手执黑格尔的哲学著作，年轻偏激，而没有这种偏激情绪，就不可能有杀身成仁的热烈信仰。

德国哲学是由米·格·帕夫洛夫^②移植到莫斯科大学内的。哲学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销。但帕夫洛夫讲授的不是物理学和农业概论，而是哲学概论。听他的课未必能学到物理学，也不能学到农艺学，然而他的讲课使人获益不浅。帕夫洛夫站在数理系门口向学生发问道：“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吗？但什么是大

① 斯坦克维奇(1813—1840)，19世纪30年代俄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莫斯科大学内斯坦克维奇小组的领导人，崇奉费希特、谢林和黑格尔哲学。

② 莫斯科大学教授。

自然？知识又是什么呢？”

这非常重要；我们的年轻人跨进大学时对哲学一窍不通，只有教会中学学生对它有些概念，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。

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帕夫洛夫在课堂上叙述谢林和奥凯恩^①的学说，他讲课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，没有一个自然哲学家比得上他。如果说他还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彻明了，那么过错不在于他，而在于谢林哲学的晦涩难懂。帕夫洛夫应受责备的，毋宁说是他停留在这哲学的《摩诃婆罗多》^②上，没有经历黑格尔逻辑学的严峻锻炼。但他甚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超出引言和概论一步，最低限度，他的教学内容是这样。这种停留在入门阶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现象，这种没有屋顶的房屋，没有房屋的地基，这种通向简陋住所的华丽前室，是完全符合俄罗斯民族精神的。我们满足于前室，不正因为我们的历史还刚刚在叩门吗？

帕夫洛夫没有完成的事，由他的一个学生——斯坦克维奇完成了。

斯坦克维奇也是一个“游手好闲”的人，终生一事无成，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尔的第一个追随者。他研究德国哲学，造诣极深，没有功利观念；他天赋的非凡才能，把许多友人引进了他所向往的活动。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，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大群学者、文学家和哲学家，别林斯基、巴枯宁、格拉诺夫斯基^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① 德国自然哲学家。

② 古印度的著名史诗，既是文学作品，又包含深刻的宗教、哲学寓意，以内容艰深，结构复杂，想象丰富著称。

③ 格拉诺夫斯基(1813—1855)，历史学家，莫斯科大学教授，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赫尔岑的好友。

我流放前，我们的小组和斯坦克维奇的小组不太融洽。他们不喜欢我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倾向，我们也不喜欢他们那种几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倾向。他们称我们为投石党分子^① 和法国人，我们称他们为感伤主义者和德国人。我们和他们公认的第一个人是格拉诺夫斯基，他对双方都伸出了友谊之手，以自己温厚的爱与和解的天性扫除了彼此误解的最后痕迹；但是当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，他还在柏林，而可怜的斯坦克维奇在科摩湖边^② 已奄奄一息，那时他才27岁。

斯坦克维奇体弱多病，天性文静，是诗人和幻想家，这样的人必然更喜爱直观和抽象思维，不愿接触生活中纯粹的实际问题。艺术的理想主义对他是合适的，在他夭折前年轻苍白的额上，这成了一顶“胜利的桂冠”。其他人太强壮，也太少诗人气质，不能长期留在理论思维中而不转向生活。纯思辨倾向是完全违背俄罗斯性格的，我们不久即会看到，俄国精神怎样改造黑格尔学说，我们的现实天性，尽管已剃度为哲学的僧侣，仍要发挥作用。但在1840年初，奥加辽夫周围的青年人还没有想到要为精神反对理论文章，为生活反对抽象概念。

新的友人接待我，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，接待出狱的囚徒，从奴役或放逐中归来的人，他们怀着尊敬和宽容的心情，欢迎我参加他们的行列，但同时毫不退让，暗示他们是今天的，而我们已属于昨天，要求我们无条件接受黑格尔的《现象学》和《逻辑学》，而且尊重他们的解释。

他们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些著作，三卷《逻辑学》，两卷《美

① 投石党运动是17世纪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王权的运动，目的在于限制国王的权力。

② 意大利米兰城以北的一个湖泊，斯坦克维奇从佛罗伦萨前往米兰时，死在那里。